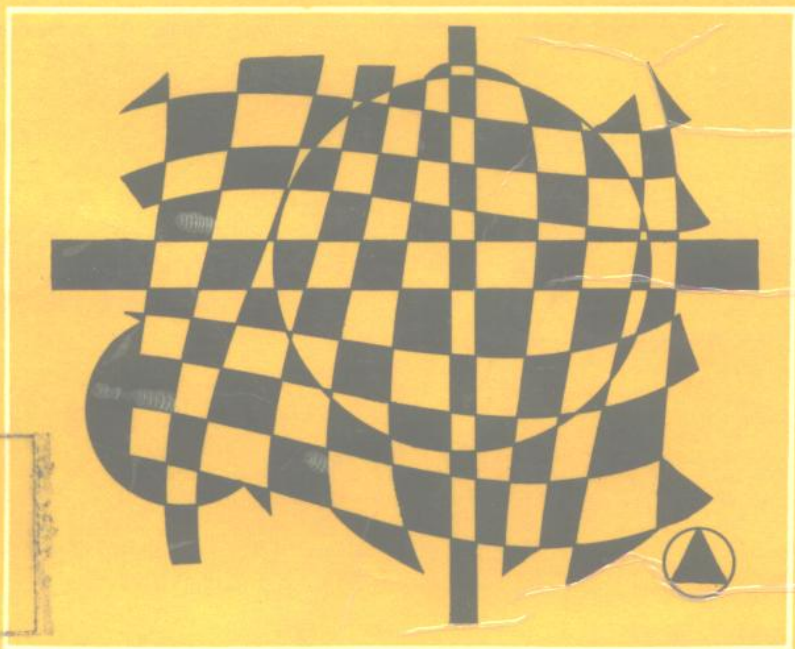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政治生活的 系统分析

〔美〕戴维·伊斯顿 著

王浦劬 等译



华夏出版社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WENKU

〔美〕戴维·伊斯顿 著

王浦劬 等译

责任编辑：张 弘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 钮 初 呼 波
李 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呼 波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by

David East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hoenix edition 1979.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美〕戴维·伊斯顿 著

王浦劬 等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5印张 432千字 插页2

1989年7月北京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册

ISBN 7-80053-206-2/D·025

定价：9.25元

中文版序言

能够就《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以中文出版事宜略作述介，令我不胜荣幸。这些年来，我几度有幸向中国学界同仁谈及本书的内容，这说明中国学人对我所述及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兴味，亦表明了他们思想的大度敞放。对于中国学者在政治探索过程中就系统思想的内涵作进一步切磋来说，这都是些祥瑞之兆。

自本书首次面世以来，荏苒二十载光阴已逝。这二十年来，恍若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政治科学历经沧桑，遭际了若许意味深长的浮泛变化。要想明了系统分析在政治科学中的现下地位，自应体味斟酌这些变化。近几年来，本书屡屡被译成各种文字，这就使我有可能就着本书问世以来政治学研究的沧桑变化，来掂量衡度系统分析在政治科学中的当前地位。我想，经常以同一种语言，使我的中国新读者们知晓我在其他著述中所作的种种思考，那委实是再合宜不过了，可是碍于语言的樊篱，这一想法恐难轻易实现。

在本书首次出版时，整个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中的主要趋势是致力于基础性研究。以往的研究遭到了抨击，因为它们缺乏科学的精确性，过分攀着于研究即时的社会问题而舍弃了基础理论，不能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种种述陈之间作出缜密甄别，忽略了理论作为悟彻之主要工具的意义（见拙作《政治系统》1953年版）。这并不是说，当时的所有学者都对以往的研究持有非议，不过，这些责难确乎代表了政治科学的主流，它们已促进了政治科学的移易革新。就其探求政治系统的基本理论来说，《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的出版既证明了新的政治科学的存在，又促进了其绵延发展。

80年代，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的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所谓反文化的革命（Counter-Cultural Revolution）——当然，不能将它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在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及希冀、追求方面引起了诸多变迁，其时，人们接受这些变迁的速度有如这些变迁自身的实质一样，都是始料未及的。今天，我们对这些变迁业已公然知晓，因而我无须再赘述其特点。在西方，我们依然处于其影响之下。

这些变迁因其特定的内容而有所不同，亦因不同的地区国度而迥然有异，可是，它们却以某种形式对整个学术界内外产生了影响。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的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鉴于世界共同体中对这些问题存在新的、仍在增长的迫切感，社会科学再度发现，亟须对这些领域予以严重而系统的关注。与其说是科学的逻辑，还不如说是种种社会问题为社会科学确定了前提。

其结果，应用性社会科学迅速开始代替早先揭示基础知识的努力。人们心中滋生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兴许仅只可以察觉，然而它却令人信服地表明：由于人类面临着核大战引发的、甚或是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生态灾难造成的全体毁灭的明显威胁，由于地球自身的存在确乎濒临绝境，因此，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要比我们过去的设想来得仓促突然。在社会科学中，甚为迫切之事似是运用我们累积的悟性和灵慧来释解现下的问题，而不是钻研基础知识。人们对于我们当前社会知识的可靠性极为有限这一点忧戚重重，这些忧戚必然既使寻求答案的限定时间愈加紧迫，又使与此相关的公民们对于答案的企求益发热切。

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潜在的、通常并不公开表露的情绪，促成了政治科学中诸如政策分析这种新的支配趋势。50年代，政治学家中公认的普遍习惯是提供有关社会变化和革新的专门咨

询，当时的批评家们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我们的知识极为有限，并不能验证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否可靠适宜。而80年代，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极大变化。政治学家公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一道，认为，如果现下社会迫切需要并期冀自己提供某些帮助，那么，即便这些帮助更多的是以所企望的可靠性为基础而不是以知识的可靠性为前提的，提供这些帮助大概也要比全然无动于衷要强些。

自从本书第一次付梓以来，政治科学中还发生了另一些重要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经济近乎一无阻滞地节节增长，而迄止50年代末，随着这种战后繁荣的消逝，经济开始成为人所关注的中心领域。美国1958年开始的一系列经济萧条给表面持久繁荣的岁月投下了阴影。人们不禁回想起了30年代大萧条的境况。基于其对于社会变化的感受，社会科学各学科迅捷开始反映这种再度兴起的对于经济的兴趣。

在政治科学中，这一点也以若干方式得到了体现。首先，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此时，人们再度承认了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

其次，再度兴起的对于经济的研究兴趣部分是由政治科学引起的，为此，政治科学中的一个旧式术语“国家”(State)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在50年代，随着行为主义的变革，作为一个概念的“国家”被认为不合乎要求，未久就为一个涵义更加丰富的术语“政治系统”所代替了。“国家”这一概念之所以会被政治学首先摒弃，是因为它早先是含糊不清的。虽然现今照我看来，它丝毫也不明晰可鉴，但它却又成了分析的术语。其原因，我在《国家重围之下的政治系统》(《政治理论》1985年第9期第303~325页)一文中已作了剖析。除此之外，这一概念复苏的原因，一定程度上

还确实在于我所说的美国社会科学受到的第三次马克思主义的冲击。第一次冲击自然是在马克思在世期间，第二次冲击则是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那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渗入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今天，在其第三次冲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尼科斯·普兰札斯(Nicos Poulantzas)的著作中所阐述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前社会科学的方向和某些理论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新生的马克思主义使“国家”这一概念得到了复苏。现在，人们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国家”作为分析的核心定向范畴予以采纳和适应，甚至那些对于同马克思主义相近的一切思想都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亦复如此。这一术语与迄今仍然普遍使用的“政治系统”概念比肩而立，两者之间的关系尴尬局促，而且常常得不到说明。

第三，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理性的人和公众选择模式。这一方法是从经济学中移植来的。首先设想由假定的理性行为者作出种种选择，再根据这种设想，建立政治行为的若干模式。经济学的这种技术性创造，起初为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了诸如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论述正义问题的著作的初始推动下，这种方法使政治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与历史的和分析的研究相分离，使政治哲学家以往那样关切研究正义和更高的道德性等实质性问题。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已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

当然，对于政治研究来说，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什么新人娇客。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9世纪就曾对此作过大量论述，前面我也已提及，30年代它在美国曾风靡一时。此外，即使行为主义在其他地方盛行时，它在欧洲也从未真正寂灭过。不过，这时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凡响之处，并不在于它要重新努力揭示国内外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照早先的政

治经济学看来，这一点是这种学说研究的核心，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所有的美国人（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人）都不认为这一点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惟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移易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也确实因为如此，许多经济学家才主张实行这种“大帝国主义”。

热衷于这一模式的历史性初次狂潮现在正开始消退。经由政治研究的各个领域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此模式的多次试验，人们正在作出早已料及的批评性反应。尽管如此，在80年代中期，理性模式一开始所具有的魅力要素尚不会消耗殆尽。

论及《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首次问世以来政治科学研究方向和方法上的所有这些变化，我又回到了开始这番议论之初所提出的问题上：随着本书被译成中文，今天，系统分析的位置何在呢？

首先，系统分析现在仍然是研究一般理论的唯一通览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竞争对手。我之所以要谓之曰“不幸”，是因为众所周知，只有某种理论方法不断为其他理论方法所替代，科学方能够获致进步。以理性的设想为基础的模式并不是系统分析的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并没有声称将适用于政治研究的一切重要领域。

一方面，因为这些模式具有简化主义的特性，所以它们恐难适用于政治研究的一切重要领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些模式用作分析单独的行为或分析被看作一个个独立单位的团体行动

者，是适宜的。而且事实证明，当这些单独行为处于竞争状况而不是合作状况时，这些模式更加有用。它们既不能被成功地运用于政治研究各重要的规定领域，亦不能圆满地研究那些可能限制、而且有时甚至支配单独行为的结构性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理性建模的范围必然要受其简化主义特性的限制。总之，如同我所指出的那样，不能想象，简化主义的理性建模是向一般政治理论迈出的一步。在广袤丰富的政治研究中，存在着许多必然的领域，即使按照这种模式最乐观的倡导者的看法，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显然也是这种模式所力难胜任的。

另一方面，系统分析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系统分析构成了其通贯整个复杂结构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若干机构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政治系统”。总之，系统分析现在仍不失为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

其次，虽然政治科学的大部分阵地已为政策研究所占领，虽然整个研究和教育系统中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而创造知识，可是，我一向认为，对于一些坚持追求基本悟性的人们来说，仍然存在着施展余地。在西方，我们现在仍然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即自50年代迄今的前几代人所积累的重要知识，还在为我们所运用。虽然在过去的岁月中，政治学学科的大多数研究都可以标榜为基础性研究，然而，今天这种研究的数量却是大大减少了。因此，一些研究者罔闻从事基础性研究的这种努力会怎样运道兴消，依然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就确实是重要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系统分析作为一个一般理论方法继续得到发展，表明人们在尽可能不断地努力促进我们的基本悟性的重要积累。

第三，系统分析的目标和取向与应用性研究的选择并无很大龃龉杯葛。譬如，政策分析得以在政治科学中确立之前很久，系

统分析就提供了政策输出、结果及政治性反馈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莫不诞生了今天政策研究的特点。只要任意检视一下政治学文献的递嬗演进，自会发现这一点。

此外，新的政治经济学与系统分析方法亦非冰雪火炭。后者明确提供了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进一步认为，人们不仅应该虑及经济系统，而且应该计及其他重要的社会系统。换言之，如果我不揣冒昧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过分专注于研究任何单独的一系列社会变量——比如经济变量，其所得到的看法并不如系统分析所具有的眼光周全成熟。系统分析并不臆断政治系统的环境中有什么单独的系统(如经济系统)是具有首要的支配性，还是如同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最终的决定性。系统分析认为现代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正确的眼光和衡度方法，惟有一般理论方法才会有承认这一点的逻辑动机。由此使我们想到，比如，早先我们曾锻造了联系心理学和人类学的链条，其结果，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称谓的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人类学等边缘学科。而且系统分析在其概念化的过程中，备下了与其他社会的、生物的及生态的系统的联系纽带，生物政治学即是一例。有些东西流行一度，而且也未必有什么错误缺失之处，譬如政治经济学即是如此。可是，我们不应认为这些东西就是确定科学总体发展中什么是最终唯一必要的标尺。

进而言之，在80年代，人们以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名义，如此强烈地吁求“使国家回到”政治分析中来〔见P·B·埃文斯(P·B·Evans)、D·鲁谢迈耶(D·Rueschemeyer)及T·斯科施波(T·Skocpol)所著《使国家回归》一书，尤见第1章，(纽约坎布里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而对于系统分析来说，这种吁求几乎不是什么新鲜货色。系统分析概念化伊始，所谓“国家”便担任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鉴于系统整局设计的着眼点，国家未曾成为这样一种中心范畴，而是被分成了其几个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即是“政治当局”。举凡熟谙系统分析的人都知道“政治当局”这一概

念是何等的重要，其原因特别在于：为政治系统制造并实施政治输出、充任政治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中介行为者的，正是政治当局。由于“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模糊难辨，因而，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是含混不清的。可是，如果它不把“政治当局”作为核心要素包含在内，那倒也是对于这一术语别出心裁的用法了。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人们尚未喧嚣着要求使“国家”回归时，它就已经是政治分析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了。而且依我们看来，这种喧嚣是多余的，因而是不必要的。当然，社会学领域中的许多人都忽略了“国家”或政治当局的独立影响。人们大多把它们视作若干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而并不认为它们自身即是政治的及其他各种政治性影响之渊藪，社会学的这些缺陷看来是严重的，然而，我们不应将这些缺陷泛泛地误认为是政治科学的特性，亦不应将其特定地误解为是系统分析观点的专利。

由此可见，很显然，系统分析是以最广泛、最一般的方式构成的，是故虽然近几十年内方法研究的方向已发生了变化，可是，系统分析对于当前政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仍具发言权。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有如此多的由系统分析所提出的概念，都已被用来解决现下所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了。

至此，尚有一个问题还未曾论及。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一贯称之为探究基本或基础知识的事业之核心。系统分析矢志于科学方法研究，真正提及科学，我们就必须直接关注当前流行于西方学术氛围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而本书的中文译本正是在这一氛围下问世的。

在西方，近十年来科学方法本身遭到了抨击。有些人想把文明的当前状况尽皆诿过于科学方法及与这种科学方法相关的种种态度，并出于这一目的，把科学方法说成是实证主义的。这些批评家们的聒噪并不是什么新东西，17世纪笛卡尔就开始意识到了科学的本质，而这些批评家们只不过是沿笛卡尔那儿作了些复售而已。由于尽人皆知的对于科学方法的不满情绪，纷攘的时节才给

这些批评家们提供了再次可资利用的论争机会。

不过，今天的不同以往之处在于，那些亲身运用科学方法的人们已认识到，他们对于自己一直运用着的科学方法的看法是过于狭窄拘谨了。它已造成了一种枯燥死板的状况，这种状况将会使科学的想象力枯萎泯灭。由于探讨理论的想法逐步减少，由于科学研究谋求新见识的本性日趋退化，科学方法已降格到只具有技术性效用了。这种看法拒绝承认隐匿于科学背后的诸多伦理目的实在是其一个组成部分。

那些谙知本书中或其他地方我的著述的人们都知道，我从未认为自己是个严格的实证主义者，我历来把这一大号用来描述那种对于科学的取向，而它现在已成了批评家们的主要矢石之的。我一直蛰首于理论工作，如果说这一工作还想揭示某些未为人知的发现的话，那么，它必定不可能与这一领域中尽人皆知的东西有过于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所以起步伊始，我所纳取的科学事业概念，就比实证主义者对于科学的阐释中有关科学事业的特定概念要活泛得多。所幸我窃自保留的这些想法欣然吻合于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们研究公认成功的科学家们的所作所为而得到的新近发现。

在这儿，我无须就此作细琐的纠缠。在拙文《美国的政治科学：过去和现在》中，我已对此作了论述〔此文已在中国翻译刊出；1985年第6期的“国际政治科学评论”亦再次予以登载，见该期第133—152页〕。我需要反复申述的只是：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不可把科学方法全然等同于早先的实证主义者的不证自明的数学方法。科学方法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正规微积分学是一道程序，它恰恰反映了诸如研究力学的这样一些物理学家可以借以处置课题的方法，因为他们所研究的课题具有特定的性质〔参见海因里希·赫茨(Heinrich Hertz)于世纪之交所撰写的《力学理论》一书〕。自20世纪以来迄前不久，实证主义的始祖维纳·西尔克(Vienna Circle)对于科学之本质所作的释义一直踞有统治地位，他断言，

所有的科学都可以以其狭隘而正统的种种概念囊括之。时至今日，人皆承认这种结论是专断而失当的。

今天，根据对于那些公认成功的科学实践者所实际走过的研究道路的切实探溯，我们已经对于过去的伟大发明背后所隐匿着形形色色的程序获得了更为精确的了解。比如，我们已经知晓，事实并非守谨的实证主义者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所有的术语都一定是运算性的；也并非所有的悟性必然要以概括或通则的形式加以凝就。实际上，非经验的分析术语和范畴，诸如概念框架、概念分类、特种(ad hoc)分类设计、定性命题及概括等均具科学特性，就此无须作特殊的辩白。尽管依实证主义者对于科学所作的狭隘阐释来看，它们不属于科学之列，可是，它们却是公认的科学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经年累世的储积。决没有任何成功的科学实践者会自省自责：理解一种现象是否会需要两种明显不一的理论，虽然这种矛盾状况未曾被尝试过，可它不可能总可以避免。如此等等。

在若干同类著作中，H·R·汉森(H·R·Hanson)，H·帕特南(H·Putnam)，D·夏皮尔(D·Shapere)，F·萨普(F·Suppe)及S·图尔明(S·Toulmin)的著作充分论述了新的科学哲学，这一科学哲学已开始使整个科学事业具有了弹性和丰富的内容，并且使它摆脱了不切实际的逻辑而步入了研究的实际领域。在西方，我们已经屡屡耳闻：科学方法并没有失灵；寂灭的只是正统的实证主义者对它的看法。科学哲学与其他学科几无二致。它对于自己所研究的课题的理解是不断成熟和变化的。在这过程中，它会对于科学方法的本质得到新颖的、不同故往的、而且如果一帆风顺的话，那就是更为精确的悟彻。

在此方兴未艾的科学方法的本质再次概念化的过程中，那些力图增加我们的基础知识、力图使科学保有逻辑和方法论的精确性的人们，有着更大的施展余地。那些武断且常常愚昧地强调规律的技术性用语的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使术语运算化，并且不管

那种种假说是何等地令人乏味，也要明确地对之展开研究和验证。他们常常谤斥为“前科学”的东西，现在实际上却成了基础知识事业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缺乏想象力的实证主义甚至迄今还在过多地影响着许多科技专家治国论者，而洞察力与这种实证主义悖然相异，它与准确的数据记录及其精确的分析一样，都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历史业已证明，科学的区域和范围的界定、概念框架的设计，对于一门学科来说，犹如真正正式确定的定理一样，是至关重要的。确实，要是没有前者，这门学科的继进发展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系统分析理所当然地是继承了科学的传统，然而，不言而喻，它是按照有关科学本质的更为新颖的、人们希望更加可靠的诠释来承袭这一传统的。

有幸与我的中国社会科学同仁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对话（宛若我们在西方进行讨论一样），使我深切感受到了殷动于中国学术界的异乎寻常的学术活动之先兆。我绝少怀疑，倘若今后几年有机会，重大的知识创新和发现将会在中国诞生，并且使其存在为国际学术界所周知。如果中国同仁对于本书中的思想所展开的讨论能够对这种知识的酝酿略有裨益，那我委实会感到荣幸欣慰之至。

戴维·伊斯顿 1987年5月

原版序言

这是关于经验取向之政治理论的长期规划中的第三部著作。第一部是《政治系统》，它力图在政治科学中提出令人信服的一般理论。第二部是《政治分析的框架》，它提出了那些在我看来似乎是这种理论由以发展的主要范畴。现在这部著作的任务，将是提出所运用的那些概念的结构，并以此进一步阐述它们，以使它们能够更加容易地被应用于经验状态。

但是，这部著作仍是一部限于理论层次的著作。其基本目的就是阐释一种概念结构，并且在有可能的地方提出某些理论的命题。其目标不在于从事论断的证实，或明确地表明这些概念的应用；验证将紧密地围绕理论建构；每一个验证都依赖于另一个验证，并对它产生有效的影响。但是，对于在这门学科的发展中持续不辍的周期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对每一个单独的需要和问题予以特殊关注。鉴于必然发生的工作专业化，我在此书中已决定专注于对经验理论的阐释。有意义的是，尽管直到最近十年为止，经验理论已经取得的支持甚微，已经得到的关注也寥寥无几。但是，它现在正日益成为政治科学中教学、训练和研究的专门领域。

本书补充了《政治分析的框架》中所省略的部分。在这里，我详尽地探究了什么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系统生活过程，探究了那些借以完成作为一个政治系统的特殊活动的功能。我将继续把政治生活当作是一个被各种不同的环境所包围的系统。由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始终有可能受到来自这些环境的压力。然而，尽管对政治生活有这样一些危险，许多系统仍有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自己的永久持续。我们的问题将难以置信的简单：甚至在经常而不断的危机下，任何类型的系统何能全然得以存在？

在寻求对经验政治理论这个核心问题的答案中，我们势必要探究这些压力的确切性质，考察那些准确地描述这些压力与政治系统相沟通的途径的概念，相当详尽地探索一个系统为处理这些压力而可能作出反应的各种方法。政治系统有能力把握命运，并造成有利于自己目的的命运，这个唯一的观念将使我们去探索它们这样做的方法。

从最终意义上说，我们不会拥有一种其术语完全成熟的理论。我们将拥有一种概念的结构，由于各种我们将在后面阐释的原因，这种概念结构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在现今的一般理论领域中就可以预料。某些通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但仅仅是副产品。

既然我们将关注于一般理论，我们就必须始终牢记在这个层次上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建设。一种理论的特点，始终将随我们有多大的决心，去密切地细察一个政治系统或随我们离它多远而转移。如果我们离得太远，我们只能见到一个最大的轮廓，而这对有关研究的引导甚微；而如果我们站得太近，我们就将如此详细地看到大量的和混乱的细节，以致于我们的处境几乎不会更好。作为一门科学，我们也许易于对过去缺乏远见，而倾向于过分强烈地窥视我们的主要事务。我在此书中建议向后退，既与我们在过去已经到达的地方相距甚远，又不至于失去所有细节的意义。的确，我们也许不时地希望进行非常紧张的观察，但是我们仅能希望零散地解释一个观点。

那些习惯于政治科学的微观研究特点的人们，将会感到难以省去这么多的东西和难以用如此广阔而急速的眼光扫过经验的地平线。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不能实现我们的主要目的——将这个系统中的关键变量独立出来，鉴别其中某些最有意义的关系，并提供一种关于理论方法的连贯思想。

理论建设有点象良好的摄影技术。如果我们起初拍摄了广角镜头，以便于我们能看到各个部分，那么，各种细节就会更加清楚，并且使得近距离特摄的各个片断更符合于一个范围更大且更连贯

的构图。这就是在此从事的这种宏观分析的唯一任务。

在《政治分析的架框》一书的序言中，我已指明我蒙受了他人
在许多年当中的恩惠，在这些年间，现在的这些思想就已开始创立
了，我将这个读本归功于那些评论。它们在此将得到同样公正而
有力的应用。

但是我再次希望表达我对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分院社会科学
研究委员会所提供的财政资助的感谢，也感谢福特政府事务研究
教授职位(1960——1961)所提供的由我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和基
金。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高级行为研究中心任职的一年
(1957——1958)，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特别系统化的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我思考了许多在本书中所论述的问题。前一年在芝
加哥，迈耶(Vicky I. Meyer)和巴茨洛夫(Ruth Butzloff)在注
释和加工整理原稿、誊印手稿和谨小慎微地组织脚注方面，立下了
汗马功劳。我还应特别感谢史密斯(Rosemary Smith)夫人在校读
冗长的手稿和依次有条不紊地进行出版的最后阶段准备方面的细
致技术。

我将此书题献给我的夫人，仅以此象征性的形式，表示对她
积极参与我每一阶段的学术、编辑和行政工作的感谢。

伊斯顿

1964年12月